

北京大学宗教学



文库

国尚师位

历史中的儒家释奠礼

[韩]

柳银珠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北京大学宗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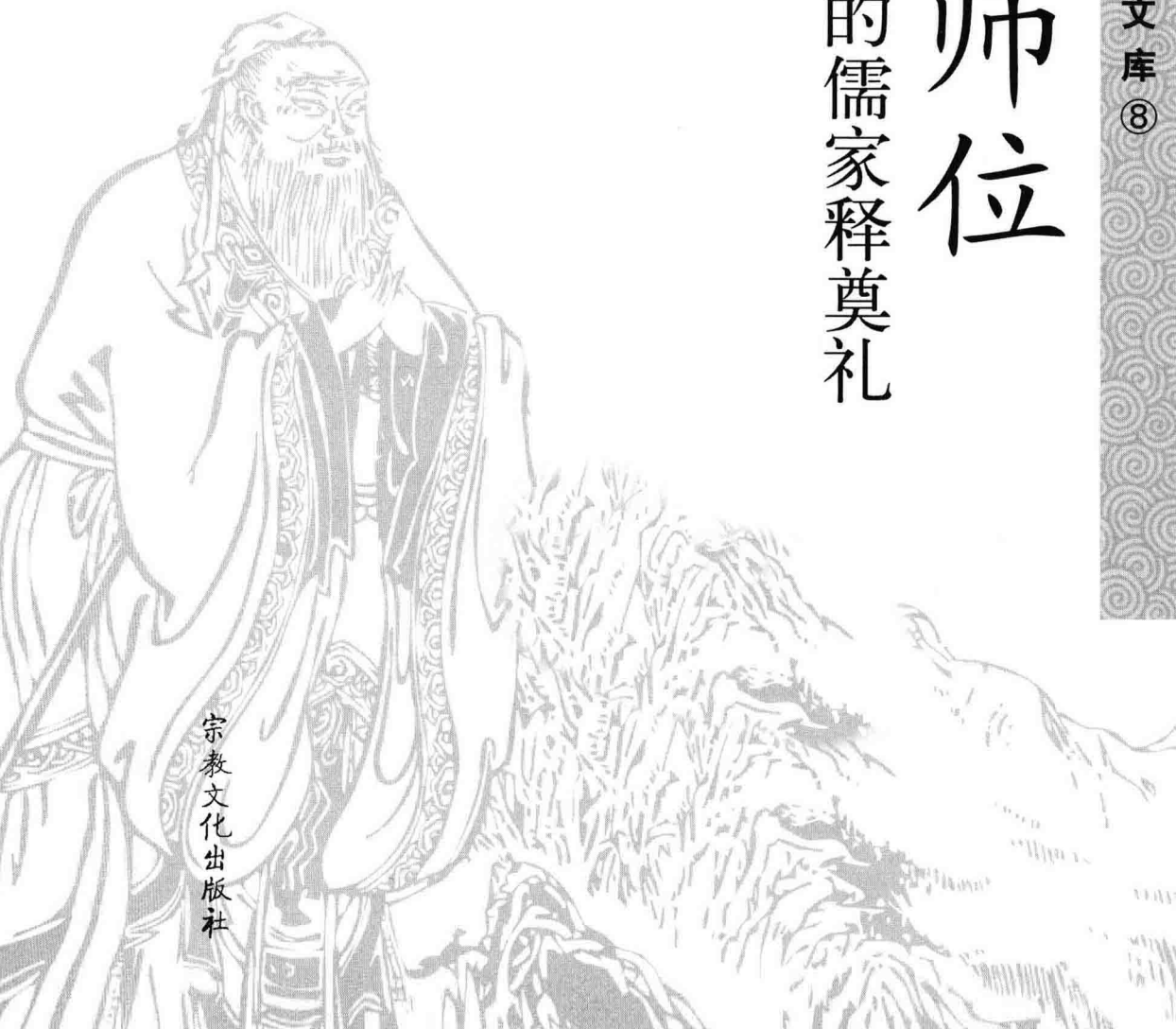
文库 ⑧

国尚师位

历史中的儒家释奠礼

〔韩〕柳银珠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尚师位:历史中的儒家释奠礼/(韩)柳银珠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80254-766-7

I. ①国.. II. ①柳... III. ①儒家-祭礼-研究 IV. ①B222.05②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129号

国尚师位

——历史中的儒家释奠礼

[韩]柳银珠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300千字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766-7

定 价: 58.00元



由释奠看学礼 (代序)

释奠礼和释菜礼都是祭礼,但我们若只从祭礼的角度看待它们,就无法把握它们的真正特点。《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注:“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皇太子劭释奠于国学,颜延年为此作长诗一首,其首四句曰:“国尚师位,家崇儒学,秉道毓德,讲艺立言。”释奠之礼,乃是古代学礼中的核心仪式;后世释奠礼成为孔子专享的祭祀,其实质礼意仍然是尊崇先师、发扬文教之意,而不是如西方或其他宗教那样,对某个超越性的神的祭祀。因此,对释奠、释菜礼的研究,其意义并不止于对祭礼的理解,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礼”。

在古代的礼制分类中,本无“学礼”之说。按照吉礼、凶礼、嘉礼、宾礼、军礼的五礼系统,与文教相关的礼一般放在嘉礼当中。而在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礼当中,祭礼、乡饮酒、乡射礼等当中,似乎都有与文教相关的礼。学礼之名正式提出,并被赋予很高的地位,是在朱子的礼学体系当中。

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对古代诸礼作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和排序:家礼八篇,乡礼四篇,学礼十五篇,邦国礼五篇,王朝礼十四篇,后黄幹续修部分中,丧礼、祭礼各十三篇。学礼十五篇的篇目是这样的:一上,学制(古无);一下,学义;二,弟子职(来自《管子》);三,少仪(来自《礼记》);四,曲礼(来自《礼记》);五,臣礼(古无);六上,钟律(古无);六



下,钟律义(古无);七,诗乐(古无);八,礼乐记(古无);九,书数(古无);十,学记(来自《礼记》);十一,大学(来自《礼记》);十二,中庸(来自《礼记》);十三,保傅(来自《大戴礼》),十四,践阼(来自《大戴礼》);十五,五学(来自《大戴礼》)。

我们在这个精心设计的篇目中,可以看到学礼的几个特点:

第一,学礼一半以上的篇目古经所无,是朱子自己创制的。本来,《仪礼经传通解》是以《仪礼》为纲,是对经书中诸礼的一个重新组合,因而大部分篇目在三礼中本来都有,只是重加组合排列而已;但在学礼十五篇中,朱子竟花了这么大精力创制篇目,以形成一个有首有尾的体系。可以说,学礼部分,是朱子礼学体系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

第二,学礼篇目包含了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朱子毕生精力所耗的两篇文献。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本为成书,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是四书的纲目,对这两篇的抽出和章句,又是朱子四书学的要害所在。而在礼学体系中,这两篇正是学礼中的一部分。可见,学礼在朱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三,在朱子精心安排的礼学体系中,学礼介于家礼、乡礼和邦国礼、王朝礼之间,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在学礼前面的家礼和乡礼,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而在学礼之后的邦国礼和王朝礼,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礼。学礼成为从日常生活向国家大礼过渡的关键环节。

朱子的礼学体系,是在宋代的生活语境中对礼意的一种诠释,值得另外专门研究。但诸礼之中应当特别重视学礼,却是朱子对传统礼制体系一个非常精到的见解。学礼,乃是五礼体系之中的另外一礼,也应该是朱子强调四书学的礼学动力。

虽然中国的礼制体系在很多地方可以和西方宗教体系相比拟,但它对文教和先师的重视,却既不同于三位一体的神,也不是简单的祖先崇拜所能概括的。因而,这个体系中的圣人既非道成肉身的神,也不是位居宗庙中的祖先,而是一个老师。正是这位老师,将家礼、乡礼的文化意义讲了出来,成为邦国、王朝的命脉所系。对这位老师的尊崇,使他的众多弟子能够努力地做到文质彬彬,并重新诠释这套礼乐体系的



内涵。而释奠礼,正是尊崇这位老师最重要的方式。

柳银珠这部书的真正价值,正是点出了学礼在儒家礼乐秩序中的关键地位。她详细梳理了中国礼制体系中释奠礼的形成,以及它在古代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其核心问题是文教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就是学统在国家祀典体系当中的位置。这对于我们把握礼乐文明的根本特征并重塑它的现代形态,当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记得在柳银珠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唐文明教授很兴奋地说,这个题目只要能做,就已经有了重要的意义。我非常同意唐教授的这一判断。在目前学界对礼制体系的研究中,家礼、祭礼、丧礼等各方面都已经有些进展,特别是对礼学史的研究也已经小有规模。但对朱子强调的学礼,却少有人提,因为它毕竟不属于传统的五礼。学礼,是隐藏在五礼之后的礼,是使五礼得以展开的礼中之礼。缺少对它的研究,我们就很难理解礼乐体系的真正价值,也就无法理解朱子以四书重新整合儒家传统的真正意义。从释奠礼的角度去讨论学政关系,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未见到真正有力量的研究。希望柳银珠的这部书能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也希望柳银珠能在礼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部书是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明研究中心支持出版的又一部著作。感谢贵阳海天园和昆明长松园的长期支持,也非常感谢杨登保先生的辛苦工作,使此书的出版得以可能。

吴 飞

2013年5月9日



绪论

一、选题缘起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作为“先圣孔子之祀”的释奠礼,是建置于国子监的文庙中的主祭孔子、附祭其他儒家圣贤的祭祀仪式。释奠礼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性仪式流传至今,为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所积极保护。其中以韩国与中国政府的保护工作最为显著。韩国政府自 1962 年开始施行《文化财保护法》,展开了对各项传统文化的保护活动,其中对释奠礼尤为重视。1986 年,以“释奠大祭”为项目名称、以成均馆释奠大祭保存会为传承单位,释奠礼被确定为韩国国家级第 85 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每年在首尔成均馆大学的文庙举行两次释奠礼,即以孔子的忌辰日为春期释奠,以诞降日为秋期释奠。

中国政府亦从 20 世纪中叶起,逐渐展开了传统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至 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国务院于 2005 年施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翌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 1986 年,曲阜市文化部门挖掘整理的释奠礼,以“祭孔大典”为项目名称,以山东省曲阜市为申报单位,被列入此遗产名录之中。现在每年于孔子的诞降日在曲阜孔庙举行祭孔大典。

如上,释奠礼是中、韩两国非常重视的传统文化保护对象,也就是说,两国都认为释奠礼代表了本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点曾经惹起了“非遗之争”。2009 年,中国一些网站展开了关于韩国释奠大祭是否“剽窃”的讨论。大多数



参与讨论者担心的是,韩国是否会抢先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把释奠礼变成韩国的。这一事件让笔者重新思考释奠礼的意义。如果没有国家主动采取的措施,释奠礼在现代的自然生存环境下,应该很快就会失传。换言之,释奠礼在现代社会中是只有得到保护才能生存的存在。这就让我们想到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采用的“博物馆”比喻。这一比喻正来源于有关孔庙的观察与感受中。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①

对于列文森来说,保存在“博物馆”就意味着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退出历史舞台。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否形成了无形的“博物馆”?中、韩两国的传统社会被推翻,进入接受西方文明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之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释奠礼就失去了过去拥有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释奠礼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与中、韩两国的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相伴相随,所以释奠礼能够给生存在全球化时代的两国人民提供关于各民族精神渊源的很多线索。可能是基于此一原因,两国政府建构了“博物馆”,把脱离现实生活的“古董”积极保护起来。那么,释奠礼虽然现在不再具有,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受到重视、得以生存的根据是什么?依靠这一根据,释奠礼在漫长、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是怎么演变的?呈现出哪些特征?通过这些信息,关于我们的过去与现在,我们能知道些什么?

在这些问题意识下,笔者将在本书中,以“学”、“政”互动为主要视角,主要探讨释奠礼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特征。而且为了考察在产生、发展、定型、传播、本土化等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释奠礼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如何保持原有的意义,笔者不把中、韩两国的释奠礼看成独立现象,而看做释奠礼随历史大河飘荡的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状态。所以本书对于中、韩两国的释奠礼没有进行均衡比较,而依据历史发展史的观点,按照时间顺序,

^① (美)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宏观地考察释奠礼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定型和传到韩国,以及在韩国本土化的全过程。在此过程当中,韩国高丽与朝鲜时代无疑是非常特别而又重要的历史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段的释奠礼进行研究,我们能够得知相关释奠礼时代意义的更多信息,由此,笔者安排大部分篇幅,对韩国高丽与朝鲜的释奠礼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一考察,笔者希望能够挖掘出一以贯之的释奠礼的存在根据,并依此突出它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与现代政权不同,运用国家仪式强化政治理念,实现社会整合。

二、相关研究概况与研究思路

迄今为止,关于释奠礼的研究有四大类型:

(一)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把释奠礼作为国家礼制体系中的一部分,研究释奠礼制度的整备过程与演变;

(二)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以释奠礼为一种学礼,研究释奠礼在儒家传统官学教育中具有的意义;

(三)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把释奠礼从祀制作为道统意识的具象物,研究释奠礼如何反映儒学主流思想的变化;

(四)从政治史(或党争史)的角度出发,把释奠礼作为统治名分的象征物,研究围绕释奠礼从祀问题展开的朝廷论议与儒林的从祀运动。下面就各类既有研究成果作以简要总结与分析。

(一)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

在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中,李申的《中国儒教史》^①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李申基于“儒教是教说”,把孔子当做和老君、释迦牟尼一样的神,探讨了各个朝代为表示尊崇孔子采取的祭孔政策与其过程中发生的制度上的重要变化。黄进兴的《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②亦是值得关注的一篇论文。黄氏把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探讨了汉唐释奠

^① 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第86卷5期,1993年。收入氏著《圣贤与圣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礼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从儒家思想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入手，考察了祭孔仪式的制度化。他的思路非常周密、清晰，考证非常严谨，给后人很多启发。朴赞洙(박찬수)在《文庙享祀祭的成立与演变》^①中全面地梳理了中、韩两国释奠礼的历史。但是，对在中国产生的释奠礼传入到韩国之后的发展、两国制度之间的异同，却少有提到。李煜(이육)则在《释奠的价值与历史》^②一文中，着重考察了韩国朝鲜时代与日本强占期的释奠礼。在此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于中、韩两国的古代礼书进行比较，考察释奠仪注具体内容的部分。另外，金海荣(김해영)^③对于高丽时代与朝鲜初期的释奠礼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古代韩国不同时期的释奠礼在制度上的异同与演变过程；郑玉子(정옥자)^④以朝鲜后期为时间范围，以中国儒家圣贤为对象，考察了释奠礼从祀制的演变过程。

以上从制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因为其研究时段较长，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关于释奠礼的宏观认识，还能让研究者能够掌握好释奠礼演变史的主要脉络。笔者认为，以上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释奠礼演变的原因。释奠礼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在保守原来面貌的同时，不断创新，扩大自身的意义，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环境。那么，让释奠礼能够如此参与到人类历史的动因是什么？释奠礼的重要变化是何种时代要求的回应？笔者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按照时间顺序，考察释奠礼在中国得以产生、定型之后，传入到韩国，适应韩国的生存环境，逐渐韩国本土化的全过程，尽可能挖掘释奠礼在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变化。而且为了究明演变的原因，以儒学与君主政治的互相作用为切入点，考察了释奠礼的历史。（“学”、“政”互动的视角问题将在下文详论）

① 박찬수, 「문묘향사제의 성립과 변천」, 『남사정재각박사고회기념동양학논총』, 서울:고려원 1984년.

② 이육, 「석전의 가치와 역사」, 『문묘일원과 석전대제』, 서울:종로구청, 2003년.

③ 김해영, 「조선초기 문묘향사제에 대하여」, 『조선시대학보』 제 15 권, 2000년.

④ 정옥자, 「조선후기 문묘사전의 이정」, 『한국문화』 제 7 권, 1986년.

(二)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

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中,高明士的一系列研究非常显著。^①高明士指出,“传统东亚教育的特质,简单说,就是实施‘庙学’教育制度。庙指孔子庙,主祀孔子,在书院曰祠,主祀先贤。”^②高氏以庙学制为前提,把释奠礼作为传统儒家官学教育的必备学礼,探讨了释奠礼在汉唐之间起到的教育作用。不仅如此,高氏认为“庙学制”是儒家文化圈的东亚诸国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要素,并依此观点,考察了韩国三国时代至朝鲜时代的庙学制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释奠礼的传入与制度化进程。盖金伟亦以释奠礼为官学学礼的核心,研究了汉唐庙学制的形成、发展与释奠礼的意义。^③盖氏认为,“汉唐学礼是国家推行儒家教化、树立国家合法性和正统信仰的重要手段”^④,而官学学礼的核心是释奠礼。换言之,在传统社会,中央与地方官学教育是把儒家统治理念合法化的核心手段,通过官学举行的释奠礼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权威,进而构建了儒家文化的权威。朴鍾培(박종배)亦在《朝鲜时代学校仪礼研究》^⑤中从教育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释奠礼。他在文中指出,朝鲜时代的仪礼活动是重要教育项目之一。他不认为朝鲜时代的学校仪礼无关于教育,或者只具有对人民、对社会的教化功能,而主张朝鲜时代的学校仪礼对于学校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其具体内容是“教育理想的仪礼化”和“作为一种教育方

①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高明士编:《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高明士:《中国教育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

高明士:《唐代的释奠礼制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大陆杂志》第61卷第5期,1980年。

高明士:《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6期,2006年。

高明士,오부윤 역,『한국 교육사 연구』,서울:대명출판사,1995년.

고명사,「나, 여시대 묘학제의 창립과 그 전개」,『대동문화연구』제23권,1989년.

② 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序言”第1页。

③ 盖金伟:《汉唐官学学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盖金伟,孙钰华:《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7年。

盖金伟:《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4期,2007年。

④ 盖金伟:《汉唐官学学礼研究》,第14页。

⑤ 박종배,「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2003년.



法的仪礼”。朝鲜时代的学校仪礼是把学校教育的理想、目的、内容和方法等如实地呈现在眼前的“学校教育的缩小版”，就是把在儒家官学教育的历史中追求并积累的教育理想仪礼化。学礼的反复实行不仅是实现它所包含的教育理想的过程，而且是对实际教育赋予终极意义的过程。尤其朴氏把文庙与道统解释为学校教育的基础，释奠礼的祭祀对象是创造教育典范的先代圣人与教师，在学校祭祀使他们使学校这一教育场所具有了神圣性，得到了升华，以此为立足点，释奠礼追求“明人伦”的教育理想。因此，释奠礼是献身于教育理想的教育性质的活动。在其他研究成果中，讨论清代地方官学释奠礼的《清代地方官学与礼仪》^①与考察宋至清代书院释奠礼的《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教育史的视角是我们探讨释奠礼时不可忽视的非常重要的角度。虽然庙学制是因释奠礼走进太学而形成的制度，但是庙学制成为普遍的教育制度之后，它为释奠礼打开了得以推广至全国的大门。换言之，释奠礼成为国家祀典体系的一员，推广至全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庙学制实现的。上述的研究成果给后人的启发甚多，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因为以上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在君主为实现政治权力的强化与统治的合法化而实施官学儒家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过程中，释奠礼使官学生将儒家的价值观内化于心的教育作用，即只探讨了君主下令举行的释奠礼对未来的官僚层带来的单方向的影响。但是在释奠礼的整个历史中，释奠礼并非由君主一人主导，儒家的官僚层亦参与到了释奠礼的演变进程。传统社会的统治集团是由君主与官僚层共同构成的。他们既是仪式形成集团（释奠仪式的制定者），亦是仪式举行集团（释奠仪式的实际举行者）。虽然君主具有礼制改革的最终决定权，但是官僚层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他们的立场，并且想尽方法贯彻他们的主张。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总是影响到释奠礼的变化。所以儒家官僚层参与到释奠礼变化过程的方式与目的亦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基于以上的思路，笔者在本书中，尽量充分考虑君主与儒家官僚层参与到释奠礼变化进程的方式与目的，以及他们围绕释奠礼形成的紧张关系得到解决的方式等。

① 霍红伟：《清代地方官学与礼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3月，第11卷第3期。

② 蓝甲云、张长明、易永卿：《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19卷第3期。

(三)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

黄进兴从儒家道统意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中国历代传统王朝的释奠礼。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之中,孔庙作为一种祭祀制度,恰好位于道统与治统之间。换言之,孔庙刚好是传统社会里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汇聚之处。”^①孔庙是“道统”的制度化,帝王的统治需要“道统”的支持,所以朝廷保护孔庙制度。但是孔庙的“道统”制度化总是由君主控制着,所以围绕孔庙制度总是存在着道统与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黄氏基于这一观点,在《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②中,探讨了君主通过对于孔庙祭祀礼仪的操纵,控制士人集团的方式。他在《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③中,探讨了儒学主流思想如何透过道统意识来左右孔庙从祀制,并造成历史上诸多的变迁。^④殷慧则在《朱熹道统观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⑤中,集中考察了朱熹通过沧州精舍的祭祀实现自己的道统说与释奠礼之统一的全进程。朱熹的道统论对于后代儒家道统论的影响非常大,不仅如此,朱熹依据自己的道统论在沧州精舍释奠礼中实施的从祀制成为之后中央官学释奠礼的蓝本。韩国朝鲜时代的释奠礼亦是基于朱熹的道统论与释奠礼形成的。简言之,朱熹就是后代儒家道统论与释奠礼的奠基者。因此,殷慧的研究成果很有学术意义。

高明士在《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⑥中提出了很有新意的看法。从道统论的角度出发的既有研究成果,大部分以宋朝以后为时间范围,宋朝以前的释奠礼与道统的关系一般为学术界所忽视。但是高氏把唐朝廷确定释奠礼制度的过程解释为树立学术权威、道统说的具体化进程。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A. Wilson)的《儒家道统与圣徒之礼仪的形成》^⑦亦是我们要注

① 黄进兴:《优入圣域》,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8页。

② 黄进兴:《优入圣域》,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8-137页。

③ 黄进兴:《圣贤与圣徒》,第47-116页。

④ 黄进兴:《圣贤与圣徒》,第47页。

⑤ 殷慧:《朱熹道统观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3期,2010年。

⑥ 高明士:《隋唐庙学制度的成立与道统的关系》,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⑦ Thomas A. Wilson, "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3, August 1996.



目的研究成果。托马斯以 15 至 17 世纪初为时间范围,研究了儒家道统通过释奠仪式得以继承和延续的方式。韩国学者大部分以朝鲜时代为主,研究道统论与释奠礼的关系。池斗焕(지두환)在《朝鲜初期文庙仪礼的整備过程》、《朝鲜前期仪礼研究》的一些篇章与其他论文中指出,^①朝鲜初期朱子学传入韩土而成为国家统治理念的过程与文庙释奠礼的整備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换言之,他认为朝鲜王朝在树立儒家道统的进程中,着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庙释奠礼制度。陈商元(진상원)、金永斗(김영두)则着重考察了朝鲜中期朝鲜道学发展并形成本国的道统谱系的过程中,时儒依据道统谱系展开的从祀运动。^②

张寿安的《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③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他以孔庙祀典为重要切入点,从明清学术转型与传统学术重整的角度观察清代学术,说明了清儒如何破除理学道统,另立儒学学统。孔庙祀典作为“道统”的制度化,入祀孔庙就意味着学术正统地位的肯定,历代孔庙祀典的每次改革都代表学术意义的转移。清代汉学复兴,也就反映在孔庙祀典的改革上。清初以降学术界批判理学限囿了儒学的知识性质,认为“道存于六经,六经载周孔之学,尊经就是尊学也就是尊道,无经则无学,无学焉有道”。^④所以对清儒而言,先秦两汉的传经之儒,尤其许慎、郑玄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在清初这一学术氛围下,孔庙祀典成为学界的争议焦点。清儒不仅致力于从治学方法和学术内容上重整儒学统脉,更加致力于从制度上恢复两汉经师的地位。清儒为了传经之儒的从祀展开努力,成功实现了郑玄复祀与许慎的从祀,具有了更加积极的推动力。郑玄、许慎的孔庙入祀,不只从制度上肯定了两汉经师和两汉经学的地位,也表明了汉学是孔门学术之正统,对其后经学界复兴两汉学术具有重要意义。从道统意识入手考察释奠礼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时间范围是宋明两代,几乎没涉及清代的释奠礼。

지두환, 『조선초기 의례연구』, 서울: 서울대출판부, 1994 년.

- ① 지두환, 「조선초기 문묘종사 논의: 정몽주, 권근을 중심으로」, 『부대사학』 제 9 권, 1985 년.
지두환, 「조선전기 문묘의례의 정비과정」, 『한국사연구』 제 75 권, 1991 년.

진상원, 「조선중기 도학의 정통계보 성립과 문묘종사」, 『한국사연구』 제 128 권, 2000 년.

- 김영두, 「조선전기 도통론의 전개와 문묘종사」, 서강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2005 년.
② 김영두, 「중종대 문묘종사 논의와 조선 도통의 형성」, 『사학연구』 제 85 호, 2007 년.
김영두, 「선조초 문묘종사 논의와 도통론의 변화」, 『한국사상사학』 제 31 집, 2008 년.

- ③ 张寿安:《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国文化》,2010 年 2 期。

- ④ 同上:第 79 页。



张守安在认同释奠礼之道统具象化功能的前提下,以道统到学统的学术话语的变化为主线,考察清代释奠礼,其细致的考证、精辟的分析为后学提供了很多启发。

张分田的《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连接》^①则是以道统到治统的政治话语的变化为主线,考察清代释奠礼的研究成果。文中指出,清代皇帝格外重视释奠礼,以至于形成皇帝亲祀跪拜孔子的仪节;这一跪拜祭祀模式的形成与持续,促使释奠礼具有前所未有的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意义;由此,统治者不仅得到了统治的正当性,而且具备了道统形象,确认了政权对道统的承袭。郭焯的《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②一文,其研究角度比较特殊。此文讨论韩愈受到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形成其道统思想的可能性。目前,学术界主要研究的是道统思想对于孔庙祭祀系统的影响,即孔庙祭祀如何反映当时的道统观念以及哪些大儒的学术思想主导孔庙祀典的变化。郭氏则换角度考察了孔庙祭祀系统对道统思想的影响。虽然此文的论述略有推测成分,但是它为进一步研究道统与孔庙祀典之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上从思想史入手的研究之重点有二:一是儒家主流思想的变化、国家对它的认可如何影响到释奠礼,二是释奠礼如何把国家赋予正统性、权威性的学派思想具象化。通过以上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学术、政治与释奠礼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是通过教育、科举、党派、外交等很多社会机制实现的。虽然其中君主的政治权力与儒者集团的学术权力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学术影响局限于“道统”,把政治影响局限于“君权”,就会忽视释奠礼演变的真正的原因以及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笔者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不再将儒家思想的影响局限于“道统”,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考察官学教育、教育经典、科举制度等有关儒学思想的社会机制影响到释奠礼的方式;对政治影响的考察亦不局限于“君权”,而把它看做君主与儒家官僚阶层的共同产物,考察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他们的外交活动影响到释奠礼的方式。

^① 张分田:《祭孔与清初帝王道统形象之连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6期,2009年。

^② 郭焯:《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四)从政治史(或党争史)的角度出发的研究

金镛坤(김용곤)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检讨了释奠礼。他在《高丽显宗代的文庙从祀》、《朝鲜初期文庙从祀》等几篇论文中,^①深入探讨了高丽朝廷以崔致远与安珦从祀文庙的决定,以及朝鲜初中期随着政治动向的变化展开的文庙从祀运动。他从当时的政治情况与学术动向入手考察释奠礼从祀制,解释了释奠礼具有的时代意义。李羲权(이희권)在《东方五贤的文庙从祀小考》与《关于郑梦周文庙从祀的考察》^②中,深入检讨了朝鲜中期士林政治开始之后,士林集团为了政治目的的实现展开的文庙从祀运动。金相五(김상오)则从李珣的从祀运动入手,考察了士林势力分裂成朋党之后,在政治斗争中,各党派为了树立自己学派的正统地位,争取执政名分,利用文庙从祀运动的情况。^③薛锡圭(설석규)关注朝鲜朝党派与学派的同源性,考察了南冥学派为强化士林政治名分,依据自身的哲学与政治运营论展开的文庙从祀运动。^④

如上,韩国学者非常注重政治史或党争史的研究角度,是因为:从古代韩国接受儒学,到朝鲜朝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得以建立,其全过程中,儒学与政治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相生相成的关系。尤其朝鲜朝始终由朱子学主导政界与学界,并且形成了相互独立的性理学学派,同时,与学派具有共同渊源的党派得以形成,随后便开始了朋党政治。各个党派因为具有不同的学术渊源,在政治斗争中,积极展开自己学派先儒的从祀运动,试图通过文庙从祀,树立自己学派的正统地位,争取执政的名分。简言之,党派之争就是学派之争,亦是文庙从祀之争。所以政治史或党争史的研究角度是我们研究韩国

김용곤, 「16세기 사림의 문묘종사운동—학문동향과 사림의 지치운동과 관련하여」,

『김철준박사화갑기념사학논총』, 서울: 지식산업사, 1983년.

김용곤, 「고려 현종대의 문묘종사에 대하여: 최치원의 경우를 중심으로」, 『고려사의 제문제』, 변태연 편, 서울: 삼영사, 1986년.

① 김용곤, 「고려 충숙왕 6년 안향의 문묘종사」, 『이원순교수화갑기념사학논총』, 서울: 교학사, 1986년.

김용곤, 「조선초기 문묘종사: 태종, 세종대를 중심으로」, 『수촌박영석교수화갑기념한국사학논총』 상, 서울: 탐구당, 1992년.

② 이희권, 「정몽주 문묘종사에 관한 일고찰」, 『전북대인문논총』 제 10 권, 1982년.

이희권, 「동방오현의 문묘종사 소고」, 『전북사학』 제 17 집, 1983년.

③ 김상오, 「당쟁사의 입장에서 본 이이의 문묘종사문제」, 『전북사학』 제 4 집, 1980년.

④ 설석규, 「선조, 광해군대 남명학파의 공론형성과 문묘종사 운동」, 『남명학연구논총』 제 8 집, 2000년.

释奠礼时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但是这些往往注重围绕释奠礼从祀制展开的政治论议,很少论及这些政治论议给释奠礼带来的仪礼上的变化及其意义。笔者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韩土独有的政治环境所引起的文庙从祀运动的意义及其带动的释奠礼的本土化过程。

(五) 其他研究成果

除了上述研究,中村荣孝的《朝鲜初期的文庙制与乡村社会》^①、朴鍾培(박종배)的《明嘉靖九年的文庙祀典改革与朝鲜的对应》^②、董喜宁的《孔庙孔像考》^③、钟涛的《魏晋南北朝的释奠礼与释奠诗》^④、李纪祥的《孔庙的形上学议题——孔子的“祭如在”与朱子的“祭圣贤之可能”》^⑤、松浦千春的《魏晋南北朝的帝位继承与释奠仪礼》^⑥等的研究成果亦给研究者很多启发。其中,李纪祥的研究是孔庙祭祀研究中罕见的探讨哲理性的研究。此文从孔子所言的“祭如在”入手,以朱子及其门人围绕“孔庙世界如何可能”一问题展开的思索与响应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孔庙与乡祠祭祀先贤的形而上的根据。松浦千春的研究亦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既有研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礼的研究极少,其原因主要是这段历史具有复杂性,且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礼显现的性质不同于先后时期的释奠礼。所以在整个释奠礼的历史中如何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礼的意义,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松浦千春在文中把皇位继承与释奠礼联系起来,探讨了释奠礼具有的将皇位继承者明示于天下的功能。但是该研究局限于释奠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到的作用,未涉及它在整个释奠礼的历史中的意义。笔者从松浦千春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在本书中,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孔子之祀成为释奠礼的关键时段,考察了释奠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汉代阙里孔氏家庙举行的孔子之祀被纳入国家祭祀范围之后,到唐

① 中村榮孝,《朝鮮初期の文廟制と郷村社會》,《久留米大學文學部紀要國際文化學科編》第15,16號,2000年。

② 박종배,「명가정 9 년의 문묘 사전 개혁과 조선의 대응: 묘호 개정 문제를 중심으로」,『동양학』제34권,2003년.

③ 董喜宁:《孔庙孔像考》,《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④ 钟涛:《魏晋南北朝的释奠礼与释奠诗》,《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

⑤ 李纪祥:《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164页。

⑥ 松浦千春:《魏晋南朝の帝位繼承と釈奠儀礼》,《东洋史论集》9号,2003年。